

龙门古阳洞窟主蠡测*

韦正^{1,2} 马铭悦¹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2. 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 山西 大同 237016

Abstract: The beginning date of the Guyang Cave and its sponsor has long been debated.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cave making is time-consuming and labor-intensive. Since it took more than 30 years during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o craft the Guyang Cave, changing sponsorship would have been normal. The historical records regarding Bhikkhu Hui Cheng in the 22nd year of Taihe (AD 498) stated that Hui Cheng “sponsored a grotto for the country,” which should be referring to the Guyang Cave. Therefore, Bhikkhu Hui Cheng may have been the cave sponsor. Another related record indicates that Yuan Xie sponsored the Jing Cave in the 4th year of Zhengshi (AD 507), which may have been the Guyang Cave. Based on 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of the niches, the niches of Yuan Xie could have been out of special arrangements, which may include W3 and W39. The three major statues at the front wall, together with W3 and W39, should have been planned in advance. The three major statues should have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Yuan Xie. Yuan Xie may have been a sponsor of the Guyang Cave.

Keywords: Guyang Cave, cave owner, Bhikkhu Hui Cheng, Yuan Xie

摘要: 古阳洞的开凿年代与窟主问题长期备受学界关注。文章认为, 洞窟开凿费时费工, 古阳洞在北魏时期连续开凿三十余年, 其间窟主更换乃情理中事。太和二十二年(498年)比丘慧成造像记中明确记载慧成“为国造石窟”, 其所开窟以指古阳洞为最宜, 故比丘慧成可能曾为窟主。又据正始四年(507年)安定王元燮造像记, “静窟”则当指古阳洞为宜。从龕像的开凿次序看, 安定王元燮龕很可能出于特殊安排, 安定王元燮龕可能包括了W3和W39。正壁三大像与W3和W39都是规划中的产物, 正壁三大像的雕造自然与元燮密切相关, 元燮曾为古阳洞窟主的可能性似应予考虑。

关键词: 古阳洞; 窟主; 比丘慧成; 安定王元燮

古阳洞是洛阳龙门石窟中最有研究价值的洞窟之一。北魏是古阳洞开凿的盛期, 古阳洞中最主要的两侧壁各八大龕和正壁一佛二菩萨像, 都完成于北魏时期。八大龕整齐排布, 一佛二菩萨体量大而精美, 这种龕像的雕造必须有人主持其事^[1], 其主事者可称之为窟主。

日本学者曾经密切关注古阳洞的开凿年代与窟主问题。1999年, 石松日奈子依据古阳洞内北壁上方太和十九年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记, 推测太和十九年(495年)开始小规模造龕。又据北壁第三层比丘慧成造石窟像记, 认为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前后石窟营造

正式开始^[2]。

2006年，日本学者上原和先生有过更为系统的论述。他驳斥了大村西崖先生在《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中，据太和十九年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记，而把古阳洞的开凿年代定于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以后这一观点，认为这是大村对于拓本的误读^[3]。上原和先生转而支持沙畹先生据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把古阳洞的开凿年代定为孝文帝迁洛之前的主张，并进一步指出，“古阳洞的始凿年代，无疑是可以追溯到后壁正面造出释迦三尊的太和七年”^[4]、“龙门石窟最早的古阳洞的开凿与北魏王室无关，而是当地汉族官民自己开凿的”^[5]。

笔者以为，洞窟开凿费时费工，主持人更换乃情理中事，如南京栖霞山窟像在南齐明僧绍时“有怀创造”，但其子明仲璋才“琢彼翠屏，爰开莲座，舍兹碧题，式建花宫。上宪优填之区，仰镂能仁之像”。此后法度禅师“又造尊像十余龕”^[6]。浙江新昌宝相寺龕像的营造更加曲折，经过僧护、僧淑、僧佑数位高僧跨越齐梁二代近三十年的经营始成。古阳洞在北魏时期连续开凿三十余年，其间窟主不可能一以贯之，相关材料也支持窟主有所变更的推测，下文试作简论。

一 比丘慧成可能曾为窟主

太和二十二年（498年）比丘慧成造像记中明确记载慧成“为国造石窟”。现将比丘慧成造像记中与本论点直接相关部分引述如下：“始平公/像一区……比丘慧成自以影濯玄流邀逢昌运率竭诚心为/国造石窟□□系答皇恩有资来业父使持节光[禄]/大夫洛州刺史始平公……遂为亡父造石像一区愿亡父神飞三[会]/[五]周十地……”^[7]（图一）

古阳洞诸龕造像记中直接提到“窟”者还有以下二龕：一是杨大眼造像记：“……震旅归阙军次□行路迳/石窟览先 皇之明踪睹盛圣之丽迹



图一 比丘慧成造像记（出自《古阳洞》第78页，图115）

瞩目彻宵泫然流感/遂为孝文 皇帝造石像一区……”^[8]二是安定王元燮造释迦像记（正始四年，507年）：“……敬就/静窟造释迦之容并其/立侍……”^[9]

杨大眼造像记中说“路迳石窟”，当是指在山崖上开凿的比较大的洞窟，可见北魏时期“石窟”的概念跟今天相似。皇甫公窟为龙门中等偏大的洞窟，在窟外的《太尉公皇甫公石窟碑》中也直称“石窟”。这种称法云冈石窟中的昙曜五窟已是如此，相关文献引取如下：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10]。由以上数例可知，比丘慧成造石像记所云“为国造石窟”相当于今天意义上的开石窟一座。

比丘慧成所开窟以指古阳洞为最宜。在比丘慧成造石像记还说“为亡父造石像一区”，这无疑就是造像记旁的结跏趺坐的释迦大龕。（图二）如果比丘慧成开龕指此龕，而开窟指他窟，则文意乖戾。合理的理解是，比丘慧成主持开凿了古阳洞窟，并在窟口北部开凿了一个大龕。如果不作这样的解释，“为国造石窟”就



图二 比丘慧成造像龕（出自《古阳洞》第74页，图110）

难以落实。

比丘慧成造像记的纪年为太和二十二年即498年，这不是古阳洞中年代最早的像龕，如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龕的年代为495年，北海王元详造像龕的年代与比丘慧成龕同为498年，孙秋生造像龕的年代有人以为是太和十七年即493年^[11]。那么，该如何理解比丘慧成主持古阳洞的开凿这件事？这可以作如下理解：比丘慧成在太和二十二年前后担任过窟主，而且有可能孙秋生龕开凿时，慧成已是古阳洞开凿的主持人；在太和二十二年慧成之父始平公亡故后，慧成为其父专门开了一龕。慧成开龕为其父始平公，主持古阳洞开凿则是“为国造石窟”。

安定王元燮造像记说“安定王元燮造仰为……亡考太傅静王……就静窟造释迦之容并其立侍”，也值得略加分析。这个“静窟”中的“窟”也是可以按照现在对石窟的定义加以理解，且所指就应该是古阳洞。造像记此句文意当在静窟中开凿了有释迦和胁侍的佛龕。有释迦和胁侍的佛龕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元燮龕，“静窟”则当指古阳洞为宜。“静窟”之名当与元

燮之父谥号静王有关^[12]。

二 安定王元燮龕可能包括W3和W39

从龕像的开凿次序看，安定王元燮龕很可能出于特殊安排。安定王元燮龕为W3，时间为正始四年（507年）。W3位于正壁右胁侍菩萨身光上部，这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位置。（图三）古阳洞北壁大龕第二排最外一龕即N317为齐郡王元祐龕，年代为517年。这个齐郡王元祐在南壁还雕有一龕S189，位于南壁第一排四个大龕之后，年代也为517年。南壁这一龕可以表明位于北壁的N317当为南北壁十六龕中的最后一龕，否则S189不需要安排到南壁第一排四个大龕之后。这也暗示517年时南北壁各八大龕已经全部各有其主了。这个时间节点比安定王元燮龕W3晚10年，也就是说，以安定王元燮之尊，其所开像龕完全有可能安排在南北壁十六龕中，但事实上并没有安排，那么，现在位置的安定王元燮W3就是刻意为之的产物^[13]。

更为重要的是，与W3相对的W39可能也是安定王龕的一部分。（图四）W3、W39分别位于左右胁侍菩萨身光上部，二龕皆为直接模仿地面



图三 古阳洞W3（出自《古阳洞》第19页，图19）

建筑样式的佛殿形龕，这在古阳洞中是罕见的^[14]。两龕体量有一定差异，W3高162厘米，宽145厘米，W39高121厘米，宽120厘米，但二龕的深度相当，分别为深22厘米、20厘米，比周围龕像明显要深，暗示了二者开凿的相关性。类似的对称式龕并不鲜见，如麦积山第78窟正壁上部左右斜上方各雕小龕一个，内塑思维菩萨和交脚菩萨。再如云冈第20窟左右壁佛像头上部的释迦多宝龕，二者都是大龕，开凿的年代与两胁侍佛可能略有不同，但本质上没有差异。二释迦多宝大龕开凿时间可能比二佛略早，但几者都应是同一规划的产物，时间差异和局部的打破或避让关系是由施工程序和估算不甚准确所造成的。

将W3与W39都推定为安定王龕还在于两龕造像思想具有内在联系。安定王龕造像记全文如下：“魏圣朝太中大夫安定/王元燮造/仰为/亡祖亲太妃/亡考太傅静王 亡妣/蒋妃及见存眷属敬就/静窟造释迦之容并其/立侍众彩圆饰云仙唤/然愿亡存居眷永离秽/趣升超遐迹常值诸佛/龙华为会又愿一切群/生咸同斯福/正始四年二月中迄。”^[15] W3主要造像为一佛二菩萨，当为“释迦之容”。W39主要造像也为三尊，两侧为菩萨装的交脚弥勒，中间主尊被毁而身份难辨。笔者所知有限，云冈第7窟后壁上层中间为菩萨装交脚弥勒，两侧为倚坐佛。（图五）云冈第8窟后壁上层两胁侍都为交脚弥勒菩萨，中间主尊为倚坐弥勒，古阳洞W39造像组合当同此。（图六）实际上，云冈第7、8窟后壁上层和古阳洞W39所表现的都是弥勒龙华三会景象，这正好可与W3造像记中的“龙华为会”相应，至于是弥勒上生还是弥勒下生在这里可不必严格区分。

之所以W3与W39可以合并考虑，还在于二者完整表现了法华思想。这一思想在龙门石窟中并不鲜见。龙门皇甫公窟所表现的就是法华思想，其主壁雕结跏趺坐的释迦，北壁雕释迦多宝并坐，南壁雕菩萨装的交脚弥勒，此窟“营造时间不会太长，很可能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一次建成的”^[16]。法华思想在古阳洞造像记中表现得甚多，如古阳洞中的杨小妃造释迦像记云：“大代



图四 古阳洞W39（出自《古阳洞》第23页，图27）



图五 云冈第七窟后壁上层（出自《云冈石窟全集》第五卷，第40-41页）



图六 云冈第八窟后壁上层（出自《云冈石窟全集》第六卷，第21页）

正始三年（506年）十二月廿二日佛弟子杨/小妃为亡父造释迦/像一躯愿亡父上/生天上弥勒三会。”^[17]又如古阳洞比丘尼惠智造释迦像记云：“永平三年（510年）十一月廿九日比丘尼惠智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造释迦像一躯愿使托生西方妙乐国土/下生人间为公主长者永离三途又愿身平安遇/与弥勒俱生莲华树下三会说法一切众/生普同斯愿。”^[18]上文所述比丘慧成造像龕主尊为释迦，造石像记中既提及“神飞三会”，也说到“鸾腾兜率”，表现的也是法华思想。法华思想是北朝最流行的佛教思想，在造像方面，北魏时期的张掖金塔寺石窟中心柱，敦煌第254、259窟中心柱都体现的是法华思想，释迦与弥勒造像相配合，构成基本组合。云冈第7、8窟后壁分上下两层，虽然第7窟后壁下层为释迦多宝并坐，第8窟后壁下层为释迦，其实并无本质差别，与上部的弥勒三尊像，表现的也都是法华思想。法华思想在北魏平城时代早已蔚然成风，洛阳时代不过是其延续。古阳洞由于多为单铺或单龕造像，没有采取将释迦与弥勒、释迦多宝与弥勒合刻的形式，但其基本思想还是法华思想无疑。古阳洞W3和W39分别占据了两侧大胁侍菩萨的头顶上部空间，而且系专门雕造，所以能够将法华思想比较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在古阳洞中是比较特殊的，当与元燮与古阳洞的特殊关系相关。

三 安定王元燮可能曾为窟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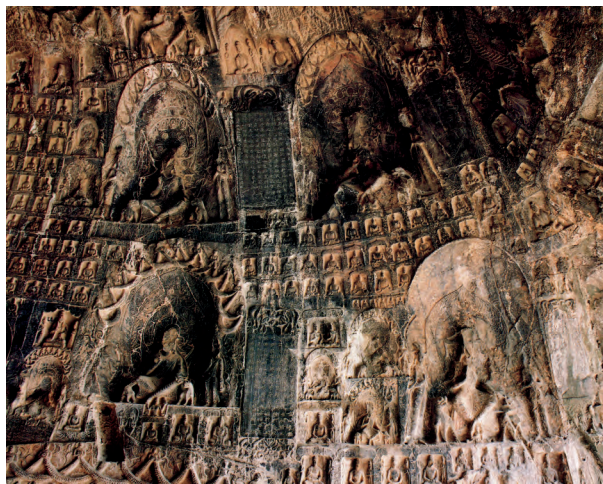
上文推测古阳洞可能因元燮之父谥静王而被称为静窟，上文还论述了W3和W39应合为元燮龕，那么，元燮之父是否可能为古阳洞窟主呢？不太可能。元燮之父为元休即拓跋休（？—494年），景穆皇帝拓跋晃之子^[19]。

拓跋休“皇兴二年封（安定王），拜征南大将军、外都大官。休少而聪慧，治断有称。高祖初，库莫奚寇边，以休为使持节、侍中、都督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仪同三司、和龙镇将。休抚防有方，贼乃款附。入为中都大官。蠕蠕犯塞，出为使持节、征北大将军、抚冥

镇大将。休身先将士，击虏退之。入为内都大官，迁太傅。及开建五等，食邑二千户。车驾南伐，领大司马”^[20]。太和十八年薨，赠假黄钺，谥号靖王，配飨恭宗庙庭。从文献记载可知，拓跋休谥号“靖王”，那么“静窟”实际上应为“靖窟”。

拓跋休去世时，古阳洞可能刚开凿不久。古阳洞造像中，只有孙秋生造像龕的年代特别早，造像记中记为太和七年，尽管有学者认为可能为太和十七年（493年）之误，但这个年代还是比其他龕像为早，而且由于此龕位于古阳洞南壁第一排从外向内第二龕，通常情况下这个位置像龕的年代不会很早，因此，493年这一年代仍然显得突兀。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龕的时间为495年，北海王元详造像龕时间为498年，这些龕主的身份都远高于孙秋生，但两龕都在两侧壁的八大龕以上。（图七）因此，孙秋生造像龕的年代还是存在疑问的。孙秋生造像龕之外，古阳洞其他龕像的年代都在孝文帝南迁之后，因此，古阳洞的开凿很可能与孝文帝迁洛相关目前看来仍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意见。如果按照这个意见的话，拓跋休作为古阳洞窟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拓跋休难以作为古阳洞窟主，但古阳洞又被称为静（靖）窟，那么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元燮成为古阳洞窟主后，将古阳洞命名为“静（靖）窟”。这在造像形态上，可以得到一些支持。W3主尊的服饰与古阳洞主尊非常接近，两者都是褒



图七 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龕与北海王元详造像龕位置示意图（出自《古阳洞》第46页，图61）

衣博带装,袈裟下摆的衣纹呈层叠状覆盖于高座之上。这种衣纹在古阳洞中有明确纪年者以W3为最早,其次是比丘惠智造释迦像龕N158(510年),再次是比丘尼法兴造释迦像龕S143(513年)。结合莲花洞、皇甫公窟等其他北魏洞窟看,这种衣纹的流行时间是公元6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定王元燮龕W3、比丘惠智龕N158和比丘尼法兴龕S143都是较早的例子。虽然这种衣纹的佛龕后来越来越多,规模也变大,但比丘惠智龕N158和比丘尼法兴龕S143都是作为填补大龕间的空隙而雕造的,这说明这种衣纹在公元6世纪中期之前尚属新生事物。于此更可见安定王元燮W3和古阳洞主尊的新颖程度。温玉成说:“在北侧菩萨军持下的衣纹间和大裙外边,各有一个正始三年(506年)小龕。衣纹边缘还有一个正始二年(505年)大龕。”^[21]这可以证明北侧菩萨乃至正壁三大像完成年代的大致下限为505年。这个年代与W3几乎同时。此时古阳洞其他大龕主要流行袒右袈裟或交脚弥勒的菩萨装。因此,就庶几可以认为正壁三大像与元燮龕(W3和W39)都是规划中的产物,正壁三大像的雕造自然与元燮难脱干系。如此,则安定王元燮曾为古阳洞窟主的可能性似应予考虑。

(致谢:本文写作得到龙门石窟研究院焦建辉先生的帮助,特此致谢!)

- [1] 石窟开凿为神圣事业,在石窟中常发现局部打破或避开早期龕像的情况,但很少发现为了开凿新窟而直接破坏早期洞窟的现象,就是对石窟开凿神圣性的有力说明。古代是私有制社会,石窟所在的山崖也不可能是无主的荒山而可以任人开凿。即便初始阶段可能因为山崖偏僻而允许自由开凿,但这个时间必为时不长。石窟开凿虽属兴造功德,但背后的经济驱动不可否认,既为了兴利,也为了避免纠纷,石窟开凿存在主要的主持人实属必要和必然。
- [2] (日)石松日奈子著,云中译.龙门古阳洞初期造像的中国化问题[J].华夏考古,1999(2):100.
- [3] [5] (日)上原和著,赵声良译.龙门石窟古阳洞开凿的年代(下)——对现行的北魏孝文帝迁洛以后营建说谬误之纠正[J].敦煌研究,2007(1):18.
- [4] (日)上原和著,于冬梅、赵声良译.龙门石窟古阳洞开

- 凿的年代(上)——对现行的北魏孝文帝迁洛以后营建说谬误之纠正[J].敦煌研究,2006(6):15.
- [6] 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78.
- [7] 刘景龙.古阳洞——龙门石窟第1443窟(附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55.
- [8] 刘景龙.古阳洞——龙门石窟第1443窟(附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66.
- [9] [15] 刘景龙.古阳洞——龙门石窟第1443窟(附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79.
- [10] (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37.
- [11] 这个年代还是有疑问,此龕外侧为比丘法生造像龕,年代为503年,不甚符合由外到内的开凿次序。另,前述上原和先生认为不存在误刻现象,而是太和七年(483年)已完成此龕的雕刻。
- [12] 《长阿含经》、《起世因本经》等佛经可见数例“静窟”之称,均与静王无涉。这为解读古阳洞“静窟”含义提供了其他可能性,暂记于此。
- [13] 以往对古阳洞开凿次序的讨论注重于从上到下的时代差异,实际上同一水平层次内的时间差异也不可忽略,值得专门讨论。
- [14] 另一较大的直接模仿地面建筑样式的佛殿形龕为南壁S136,即王仲和造观音像龕,歇山顶式佛殿龕,造像记结年为521年。该龕位于南壁第二排大龕的第三(S130)龕和第四龕(S140)之间,是八大龕完成之后雕造的。S136不仅开龕时间与W3相差甚远,而且所在位置似也不具备特殊意义。
- [16] 马世长.龙门皇甫公窟.载中国石窟·龙门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253.
- [17] 刘景龙.古阳洞——龙门石窟第1443窟(附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57.
- [18] 刘景龙.古阳洞——龙门石窟第1443窟(附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58.
- [19] (北齐)魏收.魏书·景穆十二王列传第七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4:441.
- [20] (北齐)魏收.魏书·景穆十二王列传第七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4:517.
- [21] 温玉成.龙门古阳洞研究[J].中原文物,1985:115.温玉成在此文中还根据杨大眼造像龕铭文“览先皇之明踪,睹盛圣之丽迹”推测古阳洞正壁三大像的完工时间约为504年,可备一说,但不及菩萨身上的小龕更能说明年代。

(责任编辑:黄林纳)